

“推拉”之間：香港如何避免成為“國際金融中心遺址”？

——訪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，
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（HKU ICB）創始院長劉寧榮

文 | 本刊記者 沈兩青



2023年9月，在外資撤離香港、港股近三成股票零成交等因素影響下，網絡上開始出現香港已成為“國際金融中心遺址”的論調，再輔以2023年11月29日，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通過的《香港經濟貿易辦事處認證法案》。（若美國總統確認香港經貿辦不符合在美國目前享有的特權、例外和豁免，香港經貿辦將需要關閉），此一論調，一時間甚囂塵上。

平心而論，要弄清這一論斷是否過於魯莽，先要弄明白，香港，如何能成為今日之香港。

故事或許要從1949年說起，當年10月16日，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了深圳所在的寶安縣，17日，4萬解放軍部隊繼續向南推進，距解放香港僅有一步之遙。與此同時，當年駐守香港的英軍部隊不過萬餘人，根本無法抗衡當時勢如破竹的解放軍。但為什麼解放軍在離羅湖還有40公里的樟木頭地區停住了？

記者想，對於上述問題的思考，在今日同樣適用，一個不向中央交稅的香港，應該成為一個“類”內地城市嗎？它真正的定位，是什麼？在今日，它又該如何自處？

三個關鍵詞，找到出路所在

香港大學協理副校長，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

（HKU ICB）創始院長劉寧榮在香港大學中國商業學院舉辦的“港大ICB新年展望論壇：巨變下的開放與復蘇”上，回答了記者的疑問。

他告訴記者，儘管“遺址”論言過其實，但確實反映了整個香港金融界面臨的巨大挑戰。

他認為其一，是疫情導致海外金融界人士離開了香港；其二則在於目前情況下，大家對於在香港投資的擔憂；第三點毫無疑議跟美國對中國政策有關，在香港金融市場超過半數上市企業都是中資企業的前提下，當中資企業一方面受經濟疲軟影響，同時又受到美國夾擊，導致包括像橋水這樣，曾對中國充滿信心的資金，都要從中國撤離。

所以當講到未來香港如何發展之議題時，他提到了三個階段，與三大關鍵詞。劉寧榮認為，從香港與內地的交往這一角度來看，經過了三個時期。